

论基督教与欧洲外交

张鸿石

内容提要: 基督教对欧洲影响巨大,就外交而言,它先是为其预设了原初的背景前提,继之又形塑了其行为主体——民族国家;它不仅为欧洲外交提供了基本制度规范,而且随着与民族国家结合,还对欧洲外交的发展与演变产生直接影响。在历史坐标中考察两者关系,不仅可为我们提供一个认识宗教与外交错综复杂关系的典型个案,而且对我们理解现实中的欧洲外交,甚至整个国际关系也将大有裨益。

关键词: 基督教 欧洲外交 历史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外交经常演绎出令人荡气回肠的悲喜剧,而欧洲外交¹堪称其中经典。基督教对欧洲外交的发展演变影响甚大,在欧洲外交帷幕最初开启的15世纪,基督教因素便置身其中。基督教可以说是为欧洲外交提供了最早的场景与舞台、角色与道具。马克斯·韦伯曾言:“犹太民族把原始宗教原则普及化,也很成功地将某些原始思想的重要层面融入现代世界的宗教生活中。这一点使他们有权和希腊、罗马人并立为西方文明的创立者。”²的确,基督教在欧洲不单是一种源远流长的社会现象,它还同社会各层面有着异乎寻常的紧密联系,以至于无论考察欧洲何种宏观社会现象,都要顾及其无所不在的影响。基督教与欧洲外交这场冗长剧目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与现实纠葛?有鉴

¹ 现代外交的雏形出现在15世纪的意大利,16世纪流行于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并传播到彼得大帝时的俄国。历史上,欧洲又被指称为“西方基督教世界”,其范围先局限于西欧后逐渐扩展至北欧,后又差不多将除东南欧以外的整个欧洲囊括其中。基督教对欧洲外交影响的范围大致与这个“西方基督教世界”范围相同。如果忽略上述细节,也不刻意强调西方基督教派天主教和新教的区别,欧洲各国的外交实践基本上可看作是在相似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下进行的,相较于世界其他区域国家的外交,欧洲国家外交在各层面表现出的共性明显大于差异,以至于我们完全可以用“欧洲外交”这样一个集合性概念称谓之——作者说明。

² Max Weber, *The Nation, in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48, p. 179

于国内学界在该问题上的研究相对匮乏,笔者试图拾遗补缺地对此作初步探索。

一 场景与舞台:基督教为欧洲外交预设了原初的背景前提

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巴里·布赞(Barry Buzan)曾说:“外交的起源似乎与宗教信仰密不可分”。¹ 如果将外交看做是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存在,欧洲确实提供了这方面相关证据,因为现代外交的萌芽恰好出现于15世纪的基督教世界中心意大利。不仅如此,实际上当时的外交大多还因为宗教的目的而存在,并随着宗教的扩展而延伸。对此罗伯特·吉尔平曾说:“在近代历史初期,西欧国家外交政策中的宗教目标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² 那么基督教与欧洲外交的最初关联究竟给后者带去了什么?笔者以为首当其冲的是其赖以存在的场景与舞台,因为在戏剧中场景与舞台往往会先天地影响剧目的规模与气势,背景与基调。确切地说,由基督教提供的这一场景与舞台是由相互联系的三个细部,即秩序基础、场域环境和思想基调,下文将对此进行逐一分析。

(一)基督教为欧洲外交提供了原初的秩序基础。公元3世纪,罗马皇帝康斯坦丁将基督教引入帝国,使欧洲与基督教发生了最初联系。5世纪末,法兰克国王克洛维接受基督教,使其先在西欧得到发展,以后又不断向北扩张。随着其势力增强,教会最终成为欧洲统一和秩序的主要提供者。基佐曾指出:“天主教、拉丁语,以及罗马法的记忆、帝国机构的残余,共同为支离破碎的欧洲大陆提供了某种形式的文化统一。”³ 基督教使欧洲成为文化统一体,文化的统一又推动了欧洲社会的形成,最终的结果正如赫德利·布尔所言——这个体系(欧洲国际体系)不仅是一个由各个国家组成的体系,而且是一个由分享共同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国家所组成的社会。无疑,基督教在这些“共同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正是它们奠定了欧洲最早的秩序基础。不仅如此,基督教还提供了一整套规则和制度保障机制予以维持这一秩序基础。这些规则最早由奥古斯丁确立,强调在上帝之下四海之内,所有人都属于

¹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Ren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10.

² [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宋新宁、杜建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8页。

³ [挪]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一个以基督教会为代表的共同体,任何世俗政权都不得僭越教会的绝对权威;而在教皇监护下由主教和神甫组成的遍布欧洲的教会网络则构成这一秩序的制度保障机制,它发挥了维护西方世界秩序与精神统一的作用。在早期的欧洲秩序中,教会领袖制定并得到基督教神学支持的神法与习惯法共同发挥着约束基督教世界君主和维护共同体规则的作用;¹而基督教教义则赋予该秩序以道德目标与价值意义,因为根据“原罪”假说,人类罪孽与堕落的天性使其必须要有政府和法律的管束,因此上帝创造了君主和国王,并赋予他们统治权威和为保卫安全使用暴力的正当权力,这样才能实现靠个人无法获得的和平与秩序。无疑,这一秩序首先服务于宗教的利益,但同时也包含着维护和平的道德目标。那么,这个由基督教提供的原初秩序对欧洲外交有怎样的含义呢?德里安(Der Derian)对外交所作的后现代主义式的界定,似乎有助于我们回答这一问题。德里安不赞成“外交是谈判的艺术”的观点,他提出外交是“以国家组织起来的、在一种系统中相互作用的、不和的民族思索”²。在此,他强调“一种系统”对外交的重要性,而基督教恰好给欧洲外交提供了这样一个体现着宗教秩序的国际系统。

(二)基督教为欧洲外交给定了初始的场域环境。中世纪欧洲没有发展成一个单一帝国,而是形成由若干独立国家组成的多国体系,在该体系周围是两个帝国: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这个多国体系构成了15世纪欧洲外交诞生前的场域环境,它的地理范围东起易北河与波西米亚、西抵大西洋、北至北海、南达伊比利亚半岛以及意大利,这里被称作“西方基督教世界”。这个场域的文化特征在早期是混杂和多元的,其中混杂着蛮族固有传统与罗马帝国的遗产,直到欧洲古典文化由拜占庭传入后它才逐步演变成以基督教为主的文化环境;这个场域的政治特征是典型的多国均势体系,王权衰落,封建割据严重,到处上演着“强权政治的大游戏”。早期欧洲外交就是在这样一个带有明显基督教印记的场域环境中展开的,虽然它的活动并非全部局限在“西方基督教世界”这个促狭的地理范围,它也与外部世界,特别是周围两个帝国有着特定的联系,对此汤恩比曾给予详细考察。³但是,就其主要外交活动所呈现出的性质看,还是明显带有“场域赋予”的特征,如国王与罗马教廷的关系是当时欧洲最重要的外交关

¹ [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² James Der Derian, *On Diplomacy*, Oxford Blackwell 1987, p. 42

³ [英]汤恩比:《历史研究》(下),曹卫风译,北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8-228页。

系,外交常以宗教的名义进行,主要以协调基督教世界内部关系为主。这一场域环境对欧洲外交实践和外交模式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以至于使那个时期成为“宗教和政治激情占统治地位”的时代。¹ 16、17世纪,欧洲进入军事、殖民扩张时期,基督教获得全球地位,²外交随之延伸到非基督教世界的广大区域,但依旧没有摆脱上述场域环境所带来的影响。只是到了18世纪,当民族国家认同逐步代替宗教认同以后,欧洲外交才逐步突破该场域限制。到了19世纪,民族主义的勃兴为欧洲外交注入强劲动力,欧洲外交渐次超越了王朝外交的狭窄天地,获得重大发展,此时它才完全摆脱早期场域环境的影响。但基督教为其提供的这一早期场域环境却并未因此失去意义,因为正是它给欧洲外交打上了永久的胎记,也为我们复杂外交谱系中辨识欧洲外交提供了标识。

(三)基督教为欧洲外交奠定了早期的思想基调。在中世纪欧洲的思想领域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有关共同体、普世主义及普济精神的观念了。著名政治史学家基尔克曾说:“在漫长的中世纪岁月中,基督教国家……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单一的、普世性的共同体。”共同体的观念使“西方基督教世界一度强烈地感受到自己是统一的整体”。³ 所以当时的欧洲尽管有因为教皇与皇帝、教会与国家斗争引发的一系列战争、冲突和骚乱,却仍然存在着“一个关于基督教世界团结的信仰”,而这种共同体观念后来又催生了建立世界国家和实现广泛和平的要求。⁴ 这对欧洲外交的影响是跨越时代的;此外,共同体观念还本能地为欧洲树立了一个与之对立的“他者”,这给欧洲外交赋予了宗教意味,使基督教大国之间关系与它们和非基督教国家间关系有很大不同,这种情形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未发生太大改变。基督教的“普世主义”是对罗马帝国残存的“世界帝国”观念的继承,⁵它在本质上是建立在宗教与社会相互统一的认识之上的,它所强调的是基督教道德标准和价值的普世性,这种观念在欧洲营造出了一种内在的团结意识和维护秩序的集体责任感,从而给欧洲外交提供了一种以世界主义眼光看待现实的广阔视角。而普济精神则代表着一种认为所有人最终都将得

¹ [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宋新宁、杜建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3页。

² [英]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杨雪冬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65页。

³ Otto Gierke *Political Theories of the Middle Ag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⁴ [英]马丁·怀特:《权力政治》,宋爱群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⁵ [挪]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第25页。

⁶ [英]哈罗德·尼科松:《外交学》,眺伟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44页

救的神学教义,这种观念在早期曾激发起基督教世界改变异端信仰的热情;在欧洲资本主义得到普遍发展的19世纪,又催生了扩张性的外交政策;在当代,它更以“使命意识”的形式为欧洲外交注入了强烈的意识形态动因。

基督教给欧洲外交提供的上述背景,牢固地刻印在欧洲外交的深层结构中,为欧洲外交提供了与其传统相连接的原始脐带,先天地决定了欧洲外交的内在精神和面貌,最终使其形成了独特外交气质和风格。事实上,那些通常只能在欧洲外交中才能看到的特征,如更习惯或更擅长均势运作的传统,还有倾向于将世界看做是社会而非体系结构的视角,以及在多边环境下进行协调的良好适应能力和更看重国际机制建构的偏好等等,都与基督教预设的这一背景有关。

二 角色与扮相:基督教形塑了欧洲外交的行为主体

中世纪后期基督教对欧洲社会已取得占优势的控制权,与其相对应的民族国家则在形成的最初阶段。基督教的优势地位集中表现在神权高于世俗政权上,教会作为超国家组织,将基督教神学思想中有关世界一般性质和秩序的观念意识形态化,然后凭籍这套信仰体系主宰人们的精神世界与社会生活。阿奎纳的神学政治哲学就是这一现实的观念反映,他继承奥古斯丁的思想,认为整个社会都是上帝创造的,“一切现存的事务都是由神安排的”,“天意要对一切事物贯彻一种秩序。”¹受上述观念影响,在这个欧洲历史上的前民族国家阶段,依靠上帝和普世权威存在的教皇、主教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掌控着欧洲外交事务的主导权,而君主国家因不具绝对权威,在外交这样一个极重要领域只能屈居次席,欧洲外交由此出现了行为主体“缺位”的奇特现象。

正是在这一奇怪现象背后,基督教却以一种迂回的方式开始了形塑欧洲民族国家这个“缺位”外交主体的过程。因为,在整个中世纪,基督教(尤其是其教会)都一直试图把欧洲打成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即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对此,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所谓基督教国家,就是基督教对国家的否定,而绝不是基督教在国家的实现……所谓基督教国家,就是不完备的国家,基督教则是它的不完备性的补充和神圣化。”²然而,欧洲却并未由此走向“统一的基督教世

¹ [意]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9页。

² [德]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界”，它非但没有发展成一个单一的帝国，反而出现了许多多元的政治单位。基佐曾说过，在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欧洲，“纯粹的或混合的君主政治政体、神权政治政体、共和政体、或多或少的贵族政治政体，曾这样同时繁荣昌盛地存在着。”¹他认为，正是由于基督教提供的信仰自由原则，在欧洲造就出世俗势力与宗教势力相分离的社会基础，并为欧洲早期王朝国家提供了要求摆脱教会控制和获得宗教与世俗事务自主权的原动力。由此可见，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与民族国家这对相互矛盾的对立物之间，实则存在着深刻的辩证关系，正是两者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最终推动欧洲迈入民族国家自我建构的历史进程。这给欧洲随后的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积极影响，我国学者时殷弘认为：“恒久的政治分裂是欧洲独特之处，也是现代欧洲得以兴起和腾飞的关键之一”²。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基督教自身发展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具体地或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这一系列事件当首推十字军东征，基辛格认为该事件原本有将西方转变为一个统一的神权国家之势，但最终从这场争斗中得益的却是欧洲地方性的封建世俗统治者，他们从急欲获取其支持的双方索取让步，从而增强了自身的自主性，结果使欧洲的政治分裂状况得到维持。”³这为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初步的基础。而随后到来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则对推动这一进程更具历史意义：前者虽不能看做是基督教自身发展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但它以古典文明的思想精萃为武器，对基督教文明进行批判，动摇了教会的精神统治，使宗教改革运动应运而生；后者则倡导体现着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精神”并由此引发对民族国家诞生起到构造性作用的宗教战争，这两个事件最终导致了近代民族国家体系在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产生。当然，在关注基督教与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关系时，有必要区分基督教本身与基督教会所发挥的不同历史作用。就基督教本身而言，其在形塑欧洲民族国家上确实发挥了上述那些积极作用，但对基督教来说这并非源自其历史自觉，而只能视作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后果；至于基督教会，它在中世纪始终是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阻碍性力量，在这一阶段它凭借在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的强大势能，一直试图阻止强大的欧洲民族国家的出现，不过在双方的角力中，欧洲的国王们最终

¹ [法]基佐：《欧洲文明史》，程洪逵、沅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年版，第 25、39页。

² 时殷弘：《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从 16 世纪到 20 世纪末》，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第 62页。

³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p. 27.

还是战胜了教会的权威,特别是到了13、14世纪之交,先是法王菲力四世在向教士征税问题上与教皇卜尼法八世公开对决,接着巴伐利亚公爵路易又与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展开激烈争执,这些最终动摇了教会在欧洲的神圣统治。随着民族国家在欧洲的依次出现,欧洲外交逐渐被从神的、普世的领域移开,进入到国家外交时代,至此民族国家成为欧洲外交的行为主体。

民族国家的出现,在欧洲历史上首次颠覆了基督教和国家二者的主从关系,此后基督教开始以服务于国家目标的新方式发挥其形塑外交行为体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首先,基督教通过在新的基础上与世俗事务再结合,承担了增强国家权威的基本社会政治任务。这在都铎王朝时期的英国表现最为明显;其次,它通过接受一定形式的本土化改造,使自身具有民族(或国家)特性,以此来强化国家的主权意识甚至再造国家。前者表现在英国国教会的建立上,后者则在类似北爱尔兰宗教民族主义的一系列相关努力中有所流露;再次,它通过提供或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帮助特定社会政治集团实现利益表达,从而左右国家对外政策。最后,它还通过自身的宗教激情塑造国家性格,并赋予其救世使命或道义责任。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曾谈到,基督教具有一种必须将异教徒的灵魂从地狱中拯救出来的热情,这赋予早期欧洲以扩张性格,使其表现出某种好战精神。¹ 如此看来,冷战后一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家片面强调伊斯兰教的“好战性”是有失公允的,遗憾的是汤恩比多年前就指出过的这种来自基督教世界的思想倾向在现实国际关系中依然存在。²

总之,基督教在形塑欧洲外交主体——民族国家的同时,还为其注入了性格、特性及精神,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的性质。这正像安吉洛·M·科迪维拉(Angelo M. Codevila)所说的那样:“宗教的优势,其实质和政治制度对它的态度,已影响到了国家的性质。”³ 反过来,基督教本身也在欧洲外交发展过程中成为一个某种形式的行为体,用当代英国保守主义理论家罗杰·斯克拉顿(Roger Scruton)的话讲,就是它正“赋予自身以权势机构的性质”。⁴ 在当代欧

¹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3页。

² [英]汤恩比:《历史研究》(中),曹卫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1页。

³ [美]安吉洛·M·科迪维拉:《国家的性格》,张智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1页。

⁴ [英]罗杰·斯克拉顿:《保守主义的含义》,王皖强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页。

洲,基督教精神上的权威早已丧失,但其政治上的权力依然被保留,它仍在努力寻找着作用于欧洲外交的途径和方式,对此本文其后将另作涉及。

三 行头与道具:基督教建构了早期欧洲外交的制度和规范

基督教学者早在拜占庭时期就从罗马帝国残存的古典文献中整编出许多手册、选集,为外交服务。教皇还设立枢密院,收录外交信息,并“依靠前辈对国际关系学的系统研究来训练使节日常工作所必备的观察力和判断力。”¹拜占庭时期形成的一些做法经意大利传播到欧洲,发展出欧洲外交的早期形式。8-14世纪,欧洲经历了教廷外交与王权外交的长期冲突,到16世纪,国王们也开始频繁卷入战争、结盟等国际行为,并将联姻和战争作为主要外交手段,在这个过程中,基督教主导建构了早期欧洲外交的一些基本制度和规范,主要包括:

(一)开创了外交仲裁制度。成功的仲裁需要一个持中且权威的第三方,这样的条件不是所有时代和任何国际体系都能具备的,而基督教的中世纪欧洲恰好具备上述条件。据记载,早在百年战争末期教皇使节就在交战双方居间调停,伊拉斯谟(Erasmus)在1514年就写道:“罗马教皇、红衣主教、教区主教和修道院长的正当职责就是平息各基督教君主之间的争端。”²此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也一度充当过这样的角色,虽然由于他的仲裁越来越强调自己的权威,结果使其仲裁资格遭到怀疑,但外交仲裁的做法却保留下来,并逐渐形成制度。

(二)强化了常驻外交制度。该制度由临时使节制度演变而来,与基督教有直接关系。临时使节最早出现在一些宗教意味很浓的外交场合中,如册封骑士爵位、宣战或休战等。最早有史可查的常驻代表团由米兰公爵弗朗塞斯科·斯福沙于1455年在热那亚设立,15世纪教皇向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派去了它的第一个使者。15世纪下半叶,欧洲各国之间纯粹的外交常驻代表大量增加,欧洲的王公们纷纷向罗马教廷和其他宫廷派去代表以示独立,教皇也回派自己的使节,并在罗马建立特别办公室。”³期间,罗马教廷凭借独特地位、在结盟

¹ [挪]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第21页。

² [英]波特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8页。

³ [英]埃里克·克拉克:《外交官生涯》杨修、祖源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207页。

中的重要性以及作为信息交换中心的便利条件对这一制度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以后,常驻使节在欧洲各国成为普遍制度。

(三)外交豁免制度。外交豁免权是中世纪欧洲民法和教会法规中一条由来已久的原则,该原则被“基督教统一体”的观念进一步加强,最终成为欧洲普遍公认的惯例。所以,尽管中世纪各种冲突频繁而野蛮,但保护信使和使节的制度却延续下来。当然,这一制度的形成也有世俗方面的原因,一本历史著作曾指出外交豁免权是“先有共同的需要和共同的意识而建立起某种程度的既定惯例,后来才体现为国际法的正式规定”,¹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不过以《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对外交豁免的相关规定衡量,欧洲早期形成的这一制度还远未完善。史书记载,当时常驻使节其实并没因有外交豁免而变得更安全,他们有时会被当作间谍,有时还受到人身侮辱甚至监禁拷打。

(四)中立外交制度。中立外交是一种古老国际现象,中世纪的动荡和战乱推动了该项制度的形成。正如波将金在《外交史》中所揭示的那样,中世纪产生的帝国外交曾将欧洲搅乱成战争基地。面对哈布斯堡王朝的逼人攻势,13、14世纪乌利·施韦茨、温特瓦尔登曾以永久联盟条约的形式恪守中立;在以出产雇佣军著称的瑞士联邦激发出乌尔利希·茨温利(Ulrich Zwingli)牧师一系列抚平战乱思考,在其思想影响下,16世纪瑞士放弃输出雇佣军,开始奉行中立外交政策,中立外交制度由此形成。²

基督教还对欧洲一些重要外交规范和策略形成发挥了直接影响。其中包括足以构成现代外交前提的信守条约规范,是由基督教如下一个观念衍生而来,即对条约文字的违背,在宗教上会犯下伪誓罪行,要受到开除教籍和褫夺教权的惩罚。当时,签订条约都要宣誓,违约行为被认为会遭天谴。为加强条约的可信性“在这个时期签署的条约中总是包含着宗教誓言”,³只有通过法律上的重新解释和教皇的批准才可毁约。⁴上述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当时欧洲外交盛行

¹ [英]埃尔顿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² 同上书,第123-127页。

³ [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⁴ [英]波特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一卷),第357页。

的“意大利风格”。¹ 基督教还开创了“与敌人的敌人结盟”的外交策略先河,这一策略最早运用于基督教世界内部争斗,在后来的十字军东征行动中更是时常可以看到,当时互相猜忌的双方都竞相与奥斯曼这个信仰上的敌人接近。

应该如何看待基督教在推动这些制度、规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呢?我们必须承认,基督教的作用和影响是在一个较长历史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来的,上述制度和范例形成之后,在欧洲并没有马上成为被普遍接受的形式,所以有历史学家曾提醒我们,这一时期尽管一些制度规范出现了,但“当时相信十字军东征的可能性或召开宗教大会的作用,这些可用来象征保守的观点还继续存在着。”²

四 余音与回响:基督教留给欧洲外交的历史遗产

从欧洲外交诞生的 15 世纪起,基督教对其影响迄今已持续了 500 多年。此间,基督教经历了由辉煌到衰落再到复兴的演变。18 世纪,辉煌过后的基督教遭受了理性主义、自然神论的冲击,渐趋没落。到了 19 世纪,特别是拿破仑战争后,其又重新取得曾一度失去的地位,新教、天主教、东正教等基督教各个宗派在海外的传教活动均有巨大发展。在这个世纪,基督教赋予欧洲外交一个虚妄的历史观,即西方可以通过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传播,把“落后”民族纳入理性、自由的历史演变过程。这个连西方自己也未必相信的历史观,导引出一波由欧洲发起的全球殖民扩张浪潮,使“侵略”、“扩张”一时成了欧洲外交的代名词,欧洲体系逐步演变为全球体系,欧洲成了世界外交舞台上的主要角色,这可视作是基督教留给该世纪的重要遗产。进入 20 世纪,欧洲在此前扩张过程中集聚了巨大能量,也积攒了大量矛盾,最终深陷权力政治泥沼而呈现出一些学者所指称的“外交的堕落”状态,³ 结果失控的巨大能量在欧洲进行了两次大规模集中释放,欧洲这个现代国际体系的中心由此衰落。值得一提的是,在 20 世纪基督教留给欧洲外交的遗产中并非没有积极的东西,其中最明显的主要有两个:一是由和平主义观念促成的和平运动;二是从基督教“共同体”观念中衍生出的欧洲一体化

¹ 尼科松曾谈到中世纪的外交都带有意大利风格,实际上这也是拜占庭风格,他将这种外交的基本特征概括为“离散代替了合作,分裂代替了统一,狡猾代替了理性,机巧代替了道德原则”。参见 [英] 哈罗德·尼科松:《外交学》第 42 页。

² [英] 波特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一卷),第 373 页。

³ 时殷弘:《国际政治:理论探讨、历史概观、战略思考》,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2 年版,374- 376 页。

实践,二者均对欧洲外交产生了毋须赘言的重要影响。诚然,在人类各民族的精神世界中确实都不乏对和平的信仰与企盼,但似乎唯有基督教将这种深刻思考上升为终极关怀和信念;同样,基督教和平也有毋庸置疑的两面性。仅从历史现象上看,早在中世纪初期,西方法学家就已试图用教会法和王法来规范战争了,9世纪末教会又提出“上帝的和平”概念,11世纪更创设“上帝的休战”制度。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的克莱蒙宗教会议讲话使上述概念、制度普及,从此和平成为基督教伦理的一部分,它赋予基督教世界内部以和平规范,并由此推动了反战运动的发展。¹自此,在欧洲历史上人们经常会听到基督教人文主义者谴责战争的激越声音,而且一直延宕至今。进入20世纪,基督教和平思想与19世纪兴起的大众政治参与相结合显示出巨大声势,这种声势曾给欧洲外交带来相当大的压力,以至在30年代后期竟引出若论效果几与和平主义意旨截然相反的外交政策——“绥靖政策”。至于20世纪后半叶开始的欧洲一体化实践,其当然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但基督教绝非一个可以忽视的因素。欧洲一体化根本上取决于欧洲人对彼此相似性和共同价值观的认同,而基督教的“共同体”观念和伦理体系正可为此提供本源性认知。难怪伯克在强调有助于形成欧洲“相似性”因素时首先就提到基督教,他甚至在那时就指出欧洲本身就是一个大国,只是在地方风俗和制度上存在着细微的差别。²现在,令欧洲人欣慰的是卢梭和圣-皮埃尔(Saint-Pierre)早期提出的在欧洲建立一个摆脱敌对状态、永远消除战争的“世界联邦”或“基督教共和国”设想,总算以欧盟的方式差不多实现了,不过在欣喜之余又有多少人将之与基督教的遗产联系在一起了呢?

当代,基督教对欧洲外交影响非但未因时代变迁而成绝响,反而表现出不同以往的一些新特征:其一,基督教当代复兴之旅正面临许多挑战,因此其对欧洲外交的影响也是在应对挑战中进行的。在其面对的诸多挑战中与本论题最相关的是“教会在世俗生活中的真实含义已经偏离了令教会领袖困惑不已的政治问题。”³作为回应,基督教正开始把关注点移向一度被认为是“非政治”或“低政治”的环保、弱势族群以及反堕胎等社会议题领域,并试图以此重新找到作用于欧洲外交的现实途径,可以肯定这样的努力已初收功效,这从欧洲外交近年来表现出的某些新趋向中得到证实;其二,冷战后欧洲窘迫的外交地位迫使其从多方

¹ [挪]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第26-27页。

² Edmund Burke ed., *The Annual Register*, Vol. XV, London: J. Dodsley 1772, p. 2

³ [英]罗杰·斯克拉顿:《保守主义的含义》,王皖强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页。

面找寻思想资源,因此连同基督教在内的中世纪思想观念再次浮现于欧洲外交的视野中,其突出者莫过于当下正渐以增多的有关“新中世纪主义”的议论。其实早在上世纪70年代,布尔就提出过建立一个包含着比现代国家体系更有效的和平解决冲突机制的“新中世纪主义”政治秩序设想,目前上述思想似乎正在给欧洲外交带来许多新遐想;其三,与上述特征相联系,现实欧洲外交正日渐强烈地表现出道德至上主义这一反映中世纪基督教思想特征的行为倾向,如对“人权”表现出的过分热情的关注,对一些发展中国家事务的无端指责,还有对美国某些做法表现出的不无价值的忧虑等等,均可视作是这种倾向的表现。

通观中世纪以来基督教与欧洲外交微妙复杂关系,可以得出若干一般性认识:(1)宗教在任何社会都代表一种保守力量,从本质上看基督教对欧洲外交的作用也具相似意义,但这种影响却并不一定总是消极的。16世纪伊拉斯谟和莫尔曾站在基督教人文主义立场上对近代欧洲外交进行抨击,他们激烈谴责作为解决国际争端手段的欧洲常规外交,称每个联盟、每次联姻和每次互派使臣都加深了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分歧,每一个条约本身都可以作为宣战的新理由;¹(2)宗教对外交的影响是与其他因素交织进行的,场景和环境的转换会使其影响的方式与性质发生相应变化,基督教作用于欧洲外交就曾使其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和平与扩张的两种不同性征,无疑这与当时的历史环境有关,抛开历史而谈论宗教对包括外交在内的国际政治的影响不具任何意义,这正是那些喜好把伊斯兰教与“好战”联系在一起的理论家们常犯的错误;(3)宗教对国家外交的影响是深刻的,正像历史学家克罗齐曾指出的那样,国家曾“一次次地被宗教的和道德的意识引导并且被迫适用于道德的和宗教的行为”,²联想到黑格尔对宗教与国家关系所作的那些哲理性思考,我们有理由相信基督教在未来还将深刻地影响欧洲外交。黑格尔说:“教会与国家、礼拜与生命、虔诚与德行、宗教活动与世俗活动,永远不能成为统一的整体。”³也许,基督教对欧洲外交的未来影响就将在两者的相互分离中实现。

(作者简介:张鸿石,燕山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责任编辑:孙莹炜)

¹ [英]波特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一卷),第393页。

² [意]贝内德托·克罗齐:《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田时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2页。

³ [德]乔·威·弗·黑格尔:《宗教哲学》(下册),魏庆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5页。

plementing its development policy, the EU is actively promoting its values and prompting the recipient countries to stick to the principles of democracy and good governance. Taking advantage of its “soft power”, the EU attempts to exert considerable influences on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urse with its own ideas and ac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policy has thus become an important area of its multilateral diplomacy.

90 Implications of the EU-ACP EPA to the Emerging Powers and the South-South Cooperation

YE Yu

Th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s signed between the EU and the ACP countries are set to have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to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ystem. In addition to applying the principles of equality and reciprocity to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EU and the ACP countries, the EU also insists on introducing the most-favored-nation clause towards the emerging powers into the EPA, which has the potential of hindering effective South-South trade. As one of the biggest emerging powers, China will be definitely influenced and it thus should strengthen coordination with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ake corresponding political and legal measures, so as to defend the development aspect of the Doha Round.

102 The Impacts of the Cognitive Variables on European Security Norms

ZHANG Yinghong

The European strategic culture has changed from a model of territorial defence during the Cold War period to one of global intervention in the post Cold War time. During this process the cognitive variables, consisting of internal, external, transmitt and interference ones, have played important roles. Because of changes of these four variables, the main European countries turned to regard the non-traditional threats instead of the Soviet Union as the major sources threatening their security, on the basis of which, the European Security thinking and strategic culture have changed a lo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cognitive variables and the change of European security norms, thus helping us understand the origins and trend of the new European Security Strategy and the ESDP.

114 On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European Diplomacy

ZHANG Hongshi

Christianity has exerted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Europ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diplomacy, Christianity first of all presupposed its original setting, and then shaped its agents, that is, the nation-states. Apart from supplying the basic normative systems, Christianity also brought a direct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diplomacy. To explore their relationships from a historical point of view will not only

provide some typical cases of the complex relation between religion and diplomacy, but be of great benefit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true picture of the European diplomacy, and even of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as a whole

126 Reflection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and the Civil Society

ZHENG Chunrong

With the revelation of the democratic legitimacy crisis of the EU Governance,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has been engaged actively in involving the civil society into the EU political process. Through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documents concerning the civil society,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and the civil society have changed in recent years in a twofold way. On the one hand,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turns from paying attention only to consulting the special interest groups to emphasizing the involvement of the widely defined civil society and even of all the "interested parties". On the other hand, instead of attaching importance only to the functions of the civil society to provide information and expert knowledge, in other words, to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output legitimacy,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turns to emphasise its contribution to eliminating the EU's democratic deficit and to promoting the input legitimacy of the EU Governance. This article finally gives a critical assessment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involving strategy, such as the authenticity of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the wide-ranged but empty concept of civil society as well as its representativity, and so on.

140 The Policy Networks Theory and the European Foreign Policymaking

WANG Hongyu

The EU foreign policymaking under its multilevel governance system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limitations in that it needs the flexibility and resource application capacity of network organisations to overcome the complexity and hierarchy of the EU's formal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nd to improve the interest mediation and problem-solving ability of the EU's foreign policy. The policy networks theory possesses obvious theoretical advantages in analysing and understanding issues like the interest intermediation, network structure, cooperation promotion and public-private coordination. By linking the policy networks theory with the EU's foreign policymaking,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amine how the informal actor clusters influence the process of European foreign policymaking.

ACADEMIC ACTIVITIES

151 "50 Years of the EU Law: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HUANG Deming LIU Xiameng ZHANG Chi LI Wenbo